

李京文／著

探索 与 追求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调动了十多亿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同胞振兴中华的热情和积极性，走上了近百年来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之路，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

▶▶▶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李京文／著
▼▼▼

探索^与追求

▶▶▶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与追求：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 李京文著.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0238-385-2

I. 探… II. 李… III. 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130 号

探索与追求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著 者：李京文

责任编辑：张景增 周 全

出 版 者：方 志 出 版 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33.5

字 数：595 千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238-385-2/D·3

定价：88.00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回顾与反思

(代序)

这本文集出版之时，正值中国人民喜迎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

1978 年 12 月 18 日~22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 30 年。30 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一刻，但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个人的成长来说，它却是关键的年代。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调动了十多亿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同胞振兴中华的热情和积极性，走上了近百年来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之路，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长期位居全球首位，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进入世界前列；对外开放成果巨大，开放型经济已初步建立，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的经济社会革命和文化革新运动，触及、改变了我国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甚至命运。我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在欢欣鼓舞地亲历改革开放大潮的过程中，也参与了一些方面的探索与追求。回顾这些经历，反思其中的困惑与欢乐，为能生此盛世而倍感幸福，也为未能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多贡献而不安。

我有幸参与的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的探索

我工作的第一方面是参与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我的业务领导人，也是在苏留学时的师兄）领导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

1978年前后，久已沉寂的全国理论工作开始活跃起来。此时，中央决定将原来隶属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建为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由我国著名理论家、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任院长，并通过公开招聘等形式吸收研究人员，我久已向往搞科研和教学工作，于是向于光远、马洪（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等同志提出了去社科院工作的申请。经过社科院研究和政审，同意接收我去工作，但原单位（国家建委和建材工业部）领导不同意放人。经双方协商，同意我暂以兼职身份参加社科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参加经济所的一个课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由刘国光主持（该书主编），主要成员有梁文森（副主编），田江海、沈立人（编辑小组成员）等同志。本书作者主要是社科院经济所国民经济研究室的同志，还特邀了一些所外专家参加，如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柳随华同志、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教授和高鸿业教授、对外经贸部研究所所长张培基同志、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同志等，我也算其中之一。这个课题和这本书，是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指导下，在那几年中国经济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和讨论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各个方面进一步研究；包括调查国情，总结经验，借鉴外国，从理论上进行阐述，提出建议的一个重要探索。在参加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除了参加全书的讨论外，还负责一章（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的准备与撰写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国光等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收获很大，从而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针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在这本著作里，分析界定了“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概念的内涵与意义，分析介绍了国外的理论与经验，回顾了新中国的历次经济发展战略的得失。本书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这个新路子不仅绝不同于外国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不同于外国的“变通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中国特色。例如，既注意经济增长，又不忽视人民生活；既鼓励勤劳致富，又防止贫富悬殊；既对外开放并积极利用外资，又谨防陷入外债泥坑，等等。书中提出的小康概念，不仅是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有更丰富的内涵，包括合理的充分就业、基本稳定的物价和适宜的环境保护等。这些，是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中国的新战略更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例如，我们要求的是适度消费，而不是西方的“高消费”即高浪费或过度消费，要求有更高的精神文明和安全感（低得多的犯罪率，等等）。

总之，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战略是不应用任何陈旧的发展模式来套说的。^①

在这项工作中，我被指定负责对“中国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的研究，其成果在成书时被列为第十八章，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加以论述。我在课题组的总体安排下顺利完成了任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立承担如此重要的科研任务，复杂而有趣，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和生活有深刻影响，终生难忘）。在这一章里，主要研讨了以下问题：

（1）中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和特点。首先界定了自然资源的概念——指能被人类利用、形成财富（使用价值）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潜在的自然物质和能的因素。它们是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劳动、资本和劳动对象的组成部分，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条件，包括土地、气候、水、生物和矿产等。生产过程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把自然资源转变为物质财富的过程，即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转换的过程。这个定义同当时一些仅以物质的自然属性来判定资源性质和作用的论点和认识有重大区别，它强调了资源与生产、劳动的关系，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了自然资源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率中的重要作用。本章指出：“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储量丰富，品种比较齐全，但按人口平均的资源量不多，地区差异性很大。”这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特点。^②

（2）我国开发自然资源的成就与问题。本章指出，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我国在开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很大发展。同时本章指出我国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盲目开发，不注意环境保护。如对本已较少的森林乱采滥伐，重采轻造，毁林开荒，森林火灾频发，致使一些珍贵动植物大幅减少，有的濒于绝灭。又如土地资源破坏严重，沙化面积扩大近2000万公顷，草原沙化、碱化、退化面积已占可用面积的1/4以上，水土流失面积达16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达50亿吨，黄河、长江的流失量有增无减。同时，土地浪费严重，近20年来，全国耕地被占用2920万公顷，净减1200万公顷。此外，水资源也被破坏，天然湖泊被围垦，水库泥沙淤积严重，等等。第二，自然资源不是因地制宜地利用。发展农业不顾各地的自然条件，一律要求发展种植业，“以粮为纲”，造成“农业吃草原，风沙吃良田”的严重局面。第三，许多山区、草原和水资源尚未开发。第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浪费严重。如煤矿回采率平均只有40%，社队小矿

① 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27页。

② 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45～448页。

山只有 20%，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的回采率只有 30% ~ 50%。

(3)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战略方针。我们提出，根据我国自然资源拥有情况和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要保证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其中能源资源与非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耕地等严重不足，必须大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节约挖潜。因此应在保护好国土资源的基础上，将节约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既要发挥资源优势，扩大开发，又要客观利用，珍惜和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破坏浪费。在以上方针的指导下，本章提出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几项原则：第一，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地优势；第二，对重点地区和大型矿产资源实行综合开发和利用；第三，从全局出发，考虑各种有关因素，搞好综合平衡，统筹规划。此外还提出了“适当控制自然资源直接出口，有计划地增加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的建议。

(4)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主要措施。第一，开展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全面调查与勘察，制订合理开发的长远规划。第二，加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研究。第三，做好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立法工作。第四，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有关体制并调整有关政策。第五，加强国家对国土整治的管理，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搞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限于自己的水平和当时掌握的资料，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还仅是一个开始，还很不深刻，但同时，在今天看来，当时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还不无参考价值。

二 参加海南经济特区的战略研究

我参加的第二方面工作是关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特区的探索。

1985 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稍后又被任命为经济学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接触宏观经济的机会多了起来。例如，每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社科院都接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对该五年计划中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进行总结，并对即将开始的新一轮五年计划提出建议，我作为经济学学科片的主要成员之一，责无旁贷地参与了这项工作。虽然由于我们所和我个人的专长，较多地负责“发展”部分的研究，但也要参加“改革”部分的研究（有时还要负责对“改革”与“发展”两部分的综合整理和文件起草工作）。另外，还参加了两次建设特区的调研。

第一次是 1987 年参加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调研与制定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实现的重大突破之一，是以兴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 14 个城市为代表的对外开放。1980 年，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和开放大连、青岛等 14 个沿海城市，取得了显著效果。1986 年，又决定海南建省，并建立省一级的经济特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决策。为了办好这件事，中央批准先建立海南建省筹备组。由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世杰等 5 人组成，许世杰为组长，曾担任过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为副组长。这个筹备组成立后，他们决定做好 3 件事，即制订一个施政纲领，设计一套全新的组织机构，起用一批新人。为了做好第一件事，他们邀请国家最大“人才库”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派一个专家组前去帮助制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社科院领导决定派出以副院长刘国光为首的专家组前去完成这个任务。专家组成员主要由经济片各所抽调，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沈立人、戴圆晨、张曙光，工经所的陈栋生，财贸所的李茂生，数技经所的李京文、江上舟、廖逊、刘吉丰等。由刘国光担任组长，李京文为副组长。我们于 1987 年 8~9 月到达海口，住在省委招待所里，许世杰曾任广东海南行政区书记，对海南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由他亲自向我们做第一次介绍。梁湘在深圳任市长时，曾邀请刘国光带领中国社科院专家组去帮助制订了深圳的第一个发展规划，他和刘国光及其他同志比较熟，他着重谈了对我们的要求。他说，小平同志曾对他们谈过：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宝岛，海南是第二宝岛，现在台湾发展很快，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海南还比较落后，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和建特区，就是希望加快发展，追上台湾，并成为各省市改革开放的榜样。因此请专家组按这个要求帮助制定海南的发展战略。接着，我们制订了工作计划，首先请海南的老领导和各厅、局、办的领导与有关同志向我们介绍海南的现状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听取省内专家的意见。座谈一轮后我们发现，海南岛地域比较辽阔，全岛面积约 3.68 万平方公里，只略小于台湾岛，但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人均 GDP 仅为全国平均的 2/3，比台湾更低得多。因此，要实现中央对特区的要求，必须在战略思想和经济体制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当时对几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

（1）是否把台湾作为追赶的目标？^① 在制订海南经济的战略目标时，我们考虑和参照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当时，有人提醒我们：还是不要和台湾比了，差距太大，不好解释。有位广东的同志更直率地说：别提赶台湾了，赶我们广东就行。我们说，海南和台湾自然条件相仿，又都是中国人，

① 详见李京文：《科技富国论》，198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287~300 页。

应该说脑子也差不多，你不比，人家也要比，这是没法回避的问题。海南的落后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历史原因。我们向一些老同志咨询时，钱昌照老先生就说：抗战胜利时，他曾作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接收台湾和海南，当时台湾经济初具规模，海南则一片空白。其次，国民党逃到台湾时，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经济人才和资金，再加上30多年来，日本和美国对台湾投资约有250多亿美元；海南则一直作为国防前沿，建设的少，拿走的多，对海南投资仅89亿元人民币，实际价值相当于10多亿美元。那么少的投入当然不可能得到意外的高产出。此外，还有长期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不合理的行政建制，这也是造成海南落后的重要原因。那么，海南是不是没法赶台湾了呢？经过对资金来源、发展速度、比例、人才和国外关注等的反复分析和计算，我们认为，只要实行充满活力的体制，有真正优惠的政策，5年实现海南经济翻一番还是可能的。这样，用20年时间就可以达到或赶上台湾8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海南必须实现比较高速度的发展，要比台湾发展快，比内地其他省市发展更快。我们认为应当对此充满信心。

(2) 要实现海南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主要靠什么？我们认为先要实行发展战略的大转变，即从封闭的半自然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海南的开发，首先有赖于开放。就是说，要改变长期以来的闭岛自守状态，以开放促开发，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发展外向型经济。我们认为，外向型经济不仅是一种外贸模式，而且是从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一国或一地区的发展模式。海南建省后能不能够发展成为外向型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外向型经济？怎样发展外向型经济？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有的同志认为，海南目前的经济是内向型的，难以发展成外向型经济，主张以发展“出岛型经济”来代替通常的外向型经济。的确，海南当时面向的岛内、国内（大陆）、国际三个市场中，按规模岛内市场居首，国内市场次之，国际市场很小。1986年海南外贸收购和出口总值分别为24576万元和3840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6%和2.7%。这说明海南经济主要是内向型的。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内向型的经济，不利于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难以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从这种内向型经济逐步转变为外向型的，其目标是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这种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就经济要素的流动来讲，是大量的、双向的。即商品贸易不是小进小出、中进中出，而是大进大出；资本贸易不仅是引进外资，而且要到海外投资；筹资方式应不仅是中国要到海外发行债券和股票，也应允许外国来海南发行债券和股票；从生产的角度讲，不仅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更要发展市场导向型产业，即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要受

资源的限制。海南拥有众多的较为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有丰富的待开发的自然资源，有国内蜂拥而来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只要抓住国际经济形势中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大好时机，扩大开放，实行最优惠的政策，就一定能打进国际市场，加入国际的分工和大循环，把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

当然，由于海南经济基础薄弱，要发展为外向型经济需要一个过程。当时设想：近期仍要继续加强与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和物资交流，使国内市场的份额有所上升，促进海南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同时努力扩大出口，力争出口值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使开放度或外向度有所提高。中期要以扩大出口为主，进一步提高开放度，逐步做到国外市场的份额较快上升。远期则是达到既定的开放度后（例如 40% 左右），使它巩固下来，保持出口绝对值的稳定增长。

我们在 1984 年对深圳经济进行研究时，发现深圳当时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搞成“外向型”经济。当时出口只占工农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几，主要赚了内地的钱。现在海南经济模式一定应是“外向型”的，对此都没意见，但对“外向型”的理解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只要出岛就是出口，还有的认为海南产品打出去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是内地紧缺的，因此搞“进口替代”，可以为国家节约外汇，也就是“外向型”了。

我们认为，所谓“外向型”必须是“出国型”。站在国家立场而不是站在一个省的立场看问题。“出岛型”和“进口替代型”实质还是“内销型”，以保护内地工业为主体，它们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在政策选择上有很多的不同。比如汇率，对币值是高估还是低估，高估有利进口，对出口却不利。“进口替代型”虽然节约了外汇，却不等于创造外汇。不出口不创汇，就没钱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当然也不利于经济起飞。也有同志指出，是否用“国际大循环”来表示“外向型经济”？我们则认为：“国际大循环”一词可以用，但不够准确。从大概念上讲，这是对的，从一个产品讲就不见得。比如我们陶瓷品出口，但制造陶瓷用的煤、瓷土等就不必是进口的；陶瓷出口换来的外汇，可能用来购买录音机配件，而生产出的录音机有可能在国内就出售了。因此，“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对每一个产品是正确的。对一个产品来说，可能是有进有出，也可能是一头在外。

总之，我们理解的“外向型”的真正含义，应当是参加国际分工，以国际市场的需要为导向安排生产，然后参加国际竞争，而不是以自己国家为单元，封闭式地自己安排生产，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外资，换取外汇，才能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加速海南的发展。

(3)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认为海南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能加快发展。即彻底改革旧体制是海南振兴的关键。

海南经济发展的起点低、目标高，两者之间有巨大落差。不能期望以常规的办法来创造奇迹，只有以超常规的手段才能实现超常规的目标，也就是要采取比其他特区更加彻底的开放、更加彻底的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有一个不同于内地又不同于其他特区的目标模式。为了保证实现这个要求，海南在经济上从国家取得纵向支援、与内地加强横向联系的同时，在体制上可以也必须相对独立，即所谓与全国现行体制“脱钩”，以利于加快和深化改革（但不能把“脱钩”理解为“断奶”，即在经济往来上一刀两断，那是误解）。

海南是全国的一个省，海南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海南又是彻底开放的最大特区，也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岛屿。为了加速建设成外向型的发达地区，必须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体制新模式。在对这个新模式的诸多设想中，我们认为较为合适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海南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性质反映海南模式与全国的一致性，市场经济反映海南模式的特殊性。为了把海南作为一个省和作为一个经济特区统一起来，我们认为，参照国际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做法，并根据海南要建成工农贸旅并举的综合性经济特区的要求，把海南建成一个开放型的自由经济区是较为合适的目标模式。即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社会主义的、有指导的市场经济。

我们设计了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海南所有制结构的总格局应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互相竞争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其特点：一是国有企业仍居主导地位，但将主要限于基础设施等非竞争性部门和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二是在真正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合作经济将有一定的发展；三是外资企业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外商也可以承包、租赁和购买当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四是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将会有有一个大的发展，并将实行比内地更加灵活和宽松的政策；五是各种所有制互相渗透、彼此联合的混合经济将占有重要的地位，多种投资来源及其不同组合，将导致各种股份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在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中，各种经济成分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在竞争中互相促进，优胜劣汰。第二，形成完善的开放型的市场体系。发育和完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充分发挥其评价、选优、控制和调节作

用，是海南新经济体制的核心。发育海南市场，既包括商品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在商品市场中，主要是生产资料市场，要把国家同海南之间的商品调拨（上调橡胶、糖、铁矿石等，下拨粮食、煤炭、钢材等）关系改为商品贸易关系，第一步可改为按计划数量调拨按市场价格结算，第二步再改变为按市场价格自由交易。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含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都要按照市场原则去建立、组织活动。第三，实行诱导性宏观调节。海南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节不能放弃和削弱，而是要加强。但管理和调节的方式改变了。要把直接的行政控制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还要把间接的行政协调机制转变为有宏观指导的市场协调机制，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引导、协调和监督。政府要制定指导性中长期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为宏观调节提供依据。

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提出的改革原则是：一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二要“小政府、大社会”。应当在转换政府的经济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精干、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把应当由社会和企业的事情还给社会和企业去管理，并建立和充实各种非行政化的社会组织，自行处理各项事务。新的省政府人数要比原来的行署少许多，但对原有干部必须妥善安排，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我们专家组还应省委的要求，代为设计了省政府的机构设立方案。在新方案中是有创新的。例如，根据海南投资主要来自吸引外资和外省资金的特点，省政府下没有设置省计划委员会，只建立了投资合作厅；一些同类型机构作了适当合并，如设立了文体广电厅，没有单独设立文化厅、体委、广播电视厅，等等。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有关海南特区改革开放方案都是专家组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和海南建省筹备组的意见设计的，在这个过程中，刘国光同志都亲自参与和把关，也不断地与海南领导交流协商。可惜后来执行中遇到困难，又复原了。

顺便说一说，在后来“反精神污染”时，曾有人提出，海南改革方案中提的“小政府、大社会”是“反动”的，要加以批判（因为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怎么能“变小”呢，这不是“削弱专政”吗？），但没有批起来。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啊！

关于参与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方案研究问题，除以上所述在制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时作了比较充分的思考与研讨外，在以后的一些实证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例如，1988～1989年应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邀请为深圳制订90年代发展战略时，就在海南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深圳特区在80年代发展的

情况，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当时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指出，希望这个战略能够促使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社科院专家组的成员基本上是去海南的班子，只变动了个别人。组长还是刘国光，但因他越来越忙，无暇顾及，只开头露了个面，连方案完成向市委常委汇报时也未能出席，工作基本都交给我们代办了。这个方案考虑到深圳特区在20世纪80年代已取得巨大成绩，因此，在90年代应进一步强调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巩固。这个研究报告的题目就是：《在全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 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

我参与探索的第三个方面是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号召，我曾对此作了一些论述，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过一些政策建议。80年代中，我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的同志们一起，向国家科委投标并中标重点软科学招标项目“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这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研究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集全所之力展开了长时期的研究，广泛阅读了国内外的文献与资料，运用中国的数据做了大量运算，最后完成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后来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本专著，分别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分析》、《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选择》、《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在《概论》里系统研究分析了“技术”、“技术进步”的内涵和意义；研究了产业结构及其评价指标；并重点论述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论，为本项研究奠定理论基础^①。在《分析》里全面分析了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在中国的现状、地位、发展趋势及其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及改革建议，并把全部产业分为四类进行分析，第一类产业是“优先发展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产业和电子产业；第二类产业是“基础产业”，包括农业、原材料产业、能源产业；第三类产业是“创汇产业”，包括轻纺产业、船舶工业、机械工业；第四类产业是“重要产业”，包括建材工业、汽车产业、建筑业、精细化工产业、第三产业^②。《选择》是本项目研究的第三部分，着重研究讨论技术进步模式和产业结构的目标模式选择，最后得出了“深化体制改革

^① 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

^② 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分析》，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

是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根本途径”^①。《模型》主要论述了本项目使用的主要模型——大道模型的理论（大道定律理论）和大道模型的建构方法，并着重研究了中国经济技术发展的总体定量分析模型体系，对模型体系进行了计算，并对计算结果做了专题分析，此外还介绍了当时世界上使用大道模型的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的研究与应用情况^②。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 生产率的研究

我参与研究的第四个方面是与美国乔根森教授合作研究“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的比较”。

1980年，我主持研究“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项目时，为了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曾提出邀请与我们长期合作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美籍华人刘遵义先生为我们的课题顾问。刘先生学问很高，为人谦逊，对中国友好。他对我的邀请表示感谢，但他说他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建议请他的老师——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德·乔根森教授来当顾问，并把他向我们做了介绍。乔根森教授是20世纪70~80年代在生产率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经济学家，被称为“美国生产率之父”。他系统地阐明了以资本服务的组合价格为基础的新古典投资理论，成功地将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根据物化在新增投资中的作用，创新地提出了把生产者行为理论和生产率增长的指数化与测算相结合的方法，构造了生产者行为的经济计量模型。我们在他的指导下，运用上述理论与方法在我国首次具体计算了中国1953~1990年的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动，这个计算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源泉变化情况，结论是：在1953~1990年的38年中，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6.78%，主要依靠投资和劳动投入的贡献，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仅占5.46%，年均增长率只有0.37%，即技术进步是很缓慢的；其中一部分技术进步成果又被高投入所抵消，没有带来整个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这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一直未能摆脱“高增长的贫困”的根源。

这个研究成果及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在后来出版的由李京文、乔根森、黑田昌裕、郑友敬共同主编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中有详尽的披露。正是基于上述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于20世

① 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选择》，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

② 详见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1989，经济科学出版社。

纪80年代初、中期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进步是富国之源”的科学结论，多次提建议、出书、写文章、做报告阐述这个理论。指出：探索富国之源是经济学的首要命题，无论古今中外，经济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大量论著。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都详尽地介绍了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提高在财富增值中的重要作用，并预见到了只有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消灭了旧的社会分工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有可能发展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财富的创造问题，也极为重视并进行了详尽的科学研究，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得出了劳动是创造财富最原始源泉的结论。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即科技进步日益成为创造、积累财富的主要源泉。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基础上，我大胆地向党中央建议，在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句“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实行“科技兴国”战略，国家科委曾把我的这个建议两次登在内部刊物上向中央领导报告^①。此后，中央根据各方面的建议，确定了我国的基本国策是“科教兴国”。国家科委的领导和我谈话时指出，这个战略方针也包含了“科技兴国”的内容，但比它更全面更丰富。我也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

五 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我参与研究的第五方面是对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决策机制改革的研究与探讨。

改革开放之初，我根据在国家计委、建委和建材工业部工作的体会，感觉到我国的建设规模很大，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国家投资），决策机制不科学（基本上是由各级政府主观判断决策），认为急需改革。于是主动、较早地参与研究改革基建投资制度，并参考了国外的经验，提出要通过建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度来实现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曾在当时新建立的“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内部刊物《技术经济通讯》和公开发行的《技术经济》等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和马建章、刘光大同志一起广泛介绍、宣传“可行性研究”的性质、意义和做法，并在各种场合讲课。比较重要的一次是1980年春，中国科协和国家机关党委联合举

^① 详见李京文著：《科技富国论》，198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1页。

办了一次技术经济研讨班，指定由国务院各部委的司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由于光远等同志讲课，我也被指定讲一课，题目是《可行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次讲课影响比较大。

参加研讨的领导大都承认“可行性研究”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是好东西，但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已有自己的基建投资程序，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目前应加强管理，认真执行已有的规定办法，不必再引进“洋办法”。这些同志有的是我的老领导，有的是老同事，都比较熟悉，所以我同他们进行了坦率的争论，建议他们面对现实，承认我们“自己的规定”并不那么完善科学，“洋办法”好的还是要学。多数人最后都表示要“试试看”，同意参加国家科委正在组织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的编制工作和研讨。这项工作于1987年结束后，由国家计委主持在广州开了“评审会”（我有幸应邀担任了评审组副组长），评审通过后，国家计委正式颁发，要求在重点项目“试行”。从此，可行性研究在我国逐步推开。“方法与参数”经过多年试行，不断修改完善，现在正式颁布执行“第三版”。各部门也根据国家的“规定”，制定了本专业的“方法与参数”。

在此之后，我积极参加了可行性研究这个科学方法在我国的实证应用，先后参加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一批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①

在我参加过的大型工程论证中，当首推三峡水电工程。这项世界瞩目的超大型工程，经过长期的勘察、论证，1952年国务院已经批准开工，但由于种种原因，1956年中央决定重新论证。由于工作需要，论证工作领导由国家科委改为由水电部负责，并增设了经济论证专家组。论证领导、水电部钱正英部长亲临中国社科院要求社科院派一位经济学家去主持这个专家组，经过协商，决定由刘国光副院长任论证顾问，由我参加经济论证专家组。这个组由50多人组成，苏哲文副部长任组长，我和游吉寿（时任水电部计划司司长）任副组长，分工时我自报负责论证理论方法的指导。后因苏部长辞去组长，改由游吉寿为组长，我仍为副组长，我们几次到坝区考察，并收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数据。在论证过程中，领导小组又把经济组改组为投资论证组和综合经济论证组，游吉寿和我仍负责综合经济论证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论证，我们得出了“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国家能够承受得起这个工程的建设，建议尽早开工建设”。这个结论经领导小组审查后报国务院，并由邹家华副总理在1991年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大会的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全国人大代表投票通过

① 详见李京文编著：《跨世纪重大工程技术经济论证》，199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后，三峡工程即开工建设，最近，国务院批准对三峡工程进行阶段性评估，初步评估结果表明，17年前的三峡工程论证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后，我又先后应邀参加了南水北调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和磁悬浮高速技术试验线及在长大干线应用的论证。收获都很大。有的同志曾对我说：“国家跨世纪的几项特大工程论证你都参与了，你真幸运！”确实是这样！这要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长期培养和关心。谢谢党，谢谢人民，谢谢我的老师、同学和领导，也要感谢我能生长在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还要回忆的是：1986年国家科委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软科学座谈会。万里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指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发展应用软科学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会上对什么是软科学展开热烈讨论。钱学森同志在发言中说了极重要的观点。他说：“系统工程是软科学。”受到大家一致拥护。但对他讲的第二句话“软科学就是系统工程”则有所保留，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认为软科学应是一个学科群，除系统工程外，其他一些学科，如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价值工程、博弈论等也属于软科学。会后，这些学科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六 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

我参与研究的第六方面是应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

改革开放前，没有必要对经济形势进行系统分析与预测，要做的是对计划执行与完成情况的检查并对下阶段计划指标的确定。但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根本变化。一是随着所有制的改革，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所替代，出现了决策的多元化，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也不再是“全国一盘棋”，国家、省、市、县、乡都有决策权；二是全球经济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无论政府还是企业，要了解和指导经济运行、发展，并预测未来的变化，必须依靠科学分析与预测。这就对科技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作为学习研究经济分析、预测的机构与学者，于1990年主动提出承担每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的任务，试行一年之后，正式上报国务院，经总理批准，并每年从总理基金中拨付研究专款（因此被称为“总理项目”）正式开始每年开展滚动研究。于每年春、秋两季召开研讨与发布会，年底出版正式研究成果（经济蓝皮书），由刘国光任总负责人和主编，我是副主编和执行负责人。在分析、预测之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